

大国竞争、区域自主性与“破碎地带”形成研究^{*}

廖梦琦 王 琛

【内容提要】“破碎地带”是地缘政治学中关于区域研究的重要概念。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理论认为,“破碎地带”是地缘政治不稳定的形态,其形成源于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变化,而后者受到体系和区域两个层面的影响。通过分析体系层面与区域层面两个维度,本文认为,影响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主要因素分别是大国竞争和区域自主性,大国竞争的变化形成对区域不同的介入程度,而区域自主性的高低带来不同的区域协调能力,二者的变化共同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冲突的升级扩散,造成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出现差异,从而导致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发生变化。结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选取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研究这些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进一步探讨这些区域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并以此探讨与之相关的地缘政治理论。

【关键词】 破碎地带 大国竞争 区域自主性 地缘政治结构 结构主义

【作者简介】 廖梦琦,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liaomengqi@stu2018.jnu.edu.cn

王琛,安徽师范大学巴基斯坦研究院研究员。

电子邮箱:chenwang@ahnu.edu.cn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周边中小国家的‘利基外交’对我国外交环境的影响与政策研究”(项目批准号:21CGJ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本文初稿在北京大学举办的第十五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生学术论坛上进行宣读,感谢清华大学赵可金教授、对外经贸大学魏玲教授以及北京大学祁昊天助理教授、卢晓助理教授的指点和意见,同时感谢《国际政治科学》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意见,文中纰漏,笔者自负。

《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9卷第1期(总第33期),第170—199页。

Quarterl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一、问题的提出

在国际关系中,稳定的区域秩序有益于区域、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然而,不同区域往往呈现不同的区域秩序状况,有些区域达成了区域秩序的整合,实现了稳定发展,而有些区域却长时期难以构建起稳定的秩序,得不到稳定的发展。冷战时期,由于各种原因,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冲突不断,区域秩序支离破碎,出现极为不稳定的状态,形成了地缘政治中所谓的“破碎地带”(shatterbelts)。冷战结束至今,多数区域的地缘政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例如,东南亚地区稳定发展,而中东部分地区仍旧动荡不安,为何会产生不同结果?随着地缘政治变化,在东欧等地区出现紊乱现象,特别是乌克兰问题所引发的冲突和战争,对东欧地区秩序造成破坏,是否会促使这一地区形成“破碎地带”?在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等国家的内部矛盾引来大国的介入,是否会加深这一地区的内部矛盾,形成所谓的“破碎地带”?中美关系变动、新冠疫情等带来冲击,加深了地缘政治竞争,是否会促使更多地区形成“破碎地带”?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何会出现“破碎地带”,它的形成与哪些因素有关?这些困惑都需要对“破碎地带”展开理论探讨。这不仅仅有助于理解“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也有助于发现解决之道。为此,本文尝试构筑分析框架,对“破碎地带”展开理论探讨,并选取相关案例进行实证分析。

二、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的相关研究综述

既有研究中关于“破碎地带”的研究多是概念运用,对其形成的条件与可能性的探讨尚未形成系统性理论研究。总体上看,既有研究对“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主要从大国竞争、域内冲突与地缘结构互动等视角切入。

(一) 大国竞争视角

学术界关于“破碎地带”形成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冷战时期,多数学者将其归结为大国竞争所引发的地区性冲突进一步加剧了地区的混乱局势。美

国学者伊斯特(Gordon East)认为,中欧地区(the Middle-Europe)因种族、经济和政治的分裂而爆发冲突,并不断受到外部的压力和威胁,最终沦为大国竞争的马前卒,是该地区形成“破碎地带”的主要原因。^① 美国学者菲利普·凯利(Philip L. Kelly)在这方面的研究较为深入。他认为,“破碎地带”是一个由大国控制并在此进行加剧竞争的地区。大国之所以在该地区进行竞争,是因为他们对此有强烈的兴趣,并且存在与该地区的国家建立联盟立足点的机会。因此,该地区存在将冲突升级为大国战争的巨大潜力。当一个地区出现敌对大国立足点时,就会产生“破碎地带”。^② 随着冷战的结束,凯利也在原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南美地区中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当下南美地区没有形成“破碎地带”,但其“棋盘型”(checkerboards)的国家分布格局在大国竞争下极易形成^③,整体上,凯利认为大国干预是“破碎地带”形成的主要原因。^④ 大国竞争视角从体系结构层面展开探讨,虽然体系层面的大国竞争是影响区域内地缘政治变化的重要原因,强调区域内部存在冲突的支点是引发大国介入的条件,这也是“破碎地带”形成的部分条件,但是,以上研究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大国对地区的直接干预已然发生,在这种既定情况下分析“破碎地带”,有先入为主之嫌;二是对体系层面与区域层面的互动,或者说对大国竞争的作用机制如何产生的解释不足,无法完全论证“破碎地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变化。

(二) 域内冲突视角

此外,也有观点认为“破碎地带”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区域内的冲突。“破碎地带”是在特定地区发生一连串的冲突,冲突在区域内扩散升级,使外部

① Gordon East, “The Concept and Political Status of the Shatter Zone”, in N. J. G. Pounds ed., *Geographic Essay on Eastern Europe*,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27.

② Philip L. Kelly, “Escalation of Regional Conflict: Testing the Shatterbelt Concept,”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 5, No. 2, April 1986, p. 16, p. 176.

③ Philip Kelly, *Checkerboards & Shatterbelts: The Geopolitics of South America*,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7.

④ Philip Kelly, *Classical Geopolitics: A New Analytical Model*,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力量也卷入其中。^① 国防大学唐永胜等人对冷战后的“破碎地带”的形成因素展开了分析,认为国际武装冲突比较集中地发生在所谓“破碎地带”的地理空间,历史积怨、经济贫困和国内政权衰弱等原因为冲突提供了必要条件。^② 而俄罗斯学者采取广义认知模型(Generalized Cognitive Model),对黑海和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进行了研究。他们将“破碎地带”作为地区发生冲突的一个因素,认为地区产生冲突主要源于冲突倾向、不稳定性、破碎地带和负面能量等因素,但是,他们并未明确指出这些地区如何形成“破碎地带”,只是借助黑海—里海地区的地缘政治变化进行简单的探讨。^③ 虽然以上研究认为,域内冲突的扩散、升级是构成“破碎地带”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关键特征,但域内冲突的研究视角存在一些遗漏:其一,域内冲突的泛化既是特征又是原因,这种解释是一种先入为主的视角,无法阐述“破碎地带”的形成机制;其二,无法完全解释域内冲突的泛化程度与“破碎地带”形成之间有何种关系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域内冲突矛盾的爆发、升级与扩散对于区域的稳定有影响,但与“破碎地带”的形成有何关系,对此尚未做出系统性的探讨。

(三) 地缘结构互动视角

地缘政治领域一部分学者强调对地缘结构的研究,即围绕地缘中心地带(或者地缘核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互动来对“破碎地带”的形成展开探讨。荷兰学者乌斯滕(Herman Van der Wusten)与洛浦(T. Nierop)对凯利的“破碎地带”定义进行了批判。他们指出,凯利在定义“破碎地带”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区别。凯利强调了全球层面参与者的主导作用,但并未给具有地区回旋功能的区域权力中心留下位置,而“破碎地

①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世界知识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页。

② 唐永胜、刘东哲:《破碎地带与冷战后国际武装冲突》,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第18—24页。

③ Vladimir Nikolaevich Gurba et al., “Cognitive Approaches to the Generalized Analysis of Geopolitical Conflict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re and Applied Mathematics*, Volume 119, No. 17, 2018, pp. 1459-1463.

带”是动态变化的,而非区域的永久特征。^① 美国学者科恩(Saul B. Cohen)则认为,“破碎地带”是地缘战略辖区,是夹在大国竞争之中的战略导向地区,在该区域内部深刻分裂^②;两大战略辖区中的不稳定地带,这一地区存在着内部地理、文化、宗教和政治分裂,加之其地区战略位置和经济资源吸引域外大国所施加的压力。^③ 冷战的结束虽然对于地缘政治的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但未能带来有关“破碎地带”的理论突破。尽管如此,科恩的研究则发生了变化,他基于自己冷战时期对地缘政治的探讨,对冷战后欧亚大陆的地缘政治变化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欧亚大陆辐合区(convergence zone)的变化。他认为,大国之间的多边协作是中亚和中东地区等欧亚大陆辐合区从“破碎地带”转向“门户地区”(gateway)的重要影响因素。^④ “破碎地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而变化。地缘结构互动的研究视角对于“破碎地带”的演化及其原因的探讨较为深入,使得“破碎地带”的研究能够回归于区域层面与结构层面的互动。但是,这方面的研究过于强调区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将特定的区域作为分析对象,导致其解释力有所欠缺,并未系统地阐述区域与体系结构的互动机制。

综上所述,既有研究对于“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和变化的探讨存在不足。同时,在诸多研究中出现了地缘政治研究中一个较为常见的疏漏,即将某一区域直接界定为“破碎地带”,从定义特征出发,描述其产生的原因,这就有因果互证之嫌。多数研究也未能解释区域地缘形态的变化,进而不能阐述其变化的原因,缺乏对“破碎地带”形成机制的探讨。从大国竞争视角和域内冲突视角对“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和变化展开研究,缺乏结构性的解释力。而地缘结构互动视角的研究虽然相较前二者较为深入,但对于“破碎地带”形成机制的探讨还是有所欠缺。因此,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本文

① Herman Van der Wusten and T. Nierop, “Functions, Roles and Form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Vol. 9, No. 3, July, 1990, p. 224.

② Saul B. Cohen,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ird Edition),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2015, p. 48.

③ Saul B. Cohen, “A New Map of Global Geopolitical Equilibrium: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 No. 3, 1982, p. 226.

④ Saul B. Cohen, “The Eurasian Convergence Zone: Gateway or Shatterbelt?”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 2005, Vol. 46, No. 1, pp. 1-22.

基于地缘政治结构主义理论,对相关概念进行辨析,尝试构建一个“破碎地带”形成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结合相关案例展开实证分析。

三、“破碎地带”的概念与形成因素分析

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及其逻辑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涉及“破碎地带”的概念界定与形成因素分析,因而需要对相关概念进行分析,以便于展开研究。

(一) 概念辨析与理论前提

关于“破碎地带”的概念可追溯到 20 世纪早期的地缘政治学文本中。^①大多数学者将“破碎地带”作为既定的状态,将其定义为被大国争夺的脆弱区域^②,多以此来研究中东、东欧等地区的地缘政治形态。^③杰弗里·帕克

① Paul R. Hensel and Paul F. Diehl, “Testing Empirical Propositions about Shatterbelts, 1945—76,”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3, No. 1, January, 1994, p. 33-34.

② Darren Purcell, “Terra Incognita: Mapping the Causes of Geopolitical Realities,” *Political Geography*, 2003, No. 22, pp. 43-47; Terrence W. Haverluk, Kevin M. Beauchemin, Brandon A. Mueller, “The Three Critical Flaws of Critical Geopolitics: Towards a Neo-Classical Geopolitics,” *Geopolitics*, Vol. 19, No. 1, 2014, pp. 19-39.

③ Mackubin Thomas Owens, “In Defense of Classical Geopolitics,”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Autumn 1999, Vol. 52, No. 4, pp. 59-76; Robert Harkavy, “Strategic Geography and the Greater Middle Eas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 54, No. 4, Autumn 2001, pp. 36-53; Alba Iulia Catrinel Popescu, “The Theory of the Global Domination—Russian Geo-Strategy Conceptual Framework on the Black Sea Reg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Volume V, Issue 2, 2017, pp. 42-61; Greg Simons, “Russia in the Middle East: (Re)Emergence of a New Geopolitical Shatter Belt?” in Marlene Laruelle ed., *Russia’s Policy in Syria and the Middle East*, CAP paper no. 212; “Islam in Russia, Russia in the Islamic World” Initiative, Institute for European, Russian, and Eurasian Studies, 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 January, 2019, pp. 35-42; 田文林:《地缘政治、中东破碎地带与利比亚战争》,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1 年第 4 期,第 26—32 页;马腾等:《中、美、俄与中东欧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变》,载《经济地理》,2022 年第 6 期,第 1—12 页。

(Geoffrey Parker)将“破碎地带”界定为“位于两个或更多的强盛和稳定区域之间的国际上的不稳定地带”。^① 国内学者忻华将“破碎地带”定义为从巴尔干半岛经中东、克什米尔地区、喜马拉雅山南麓直到东南亚的一条斜贯欧亚大陆南部的地带。^② 吴仕海则认为,“地缘破碎带”是一个受外部竞争大国干预而引起内部陷入政治、经济、宗教、种族、语言和文化等多种不稳定或破碎化状态的区域,而且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演化的地理区域。^③ 这些对“破碎地带”的概念界定,多是建立在对特定地理区域的地缘政治状态分析的基础上,且在解释“破碎地带”形成原因之时又是基于概念中的特征展开分析,并未反映相关区域地缘政治状态变化。因此,本文所要研究的核心概念“破碎地带”是围绕区域地缘政治状态的变化。结合现有研究以及地缘政治相关理论,笔者认为,“破碎地带”是指一个地理区域的不稳定的地缘政治形态,这种形态随着区域内外的地缘政治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演化。本文的核心问题是研究“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将探讨地理区域中地缘政治的变化规律。

在地缘政治学中,地缘政治结构主义理论认为,地缘政治形态受到地缘政治结构的影响,“破碎地带”的形成也就取决于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化。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根据结构的稳定程度可以分为紧密型、松散型,稳定程度越高越紧密,反之则为松散型,不同地缘政治结构决定地缘政治形态。^④ 也就是说,区域是否形成“破碎地带”的地缘政治形态,取决于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的结构下呈现出不同的区域地缘政治形态,本文研究的内容是探究何种因素导致了区域政治结构形成“破碎地带”的地缘政治形态。地缘政治结构主义的理论认为,地缘政治系统是由大国关系构成的结构与互动的单元构成,区域地缘政治结

① 参见杰弗里·帕克著,李亦鸣、徐小杰、张忠荣译,李亦鸣校:《二十世纪的西方地理政治思想》,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03页。

② 忻华:《“破碎地带”:当代国际关系的地理枢纽》,载《世界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第100—106页。

③ 吴仕海,阎建忠:《地缘破碎带研究进展及展望》,载《地理科学进展》,2022年第6期,第1111页。

④ 参见徐立恒著:《区域地缘政治的结构主义解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69—71页;陆俊元著:《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时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5—138页。

构是地缘政治系统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变化受到大国关系和单元的互动关系的影响。^①因此,本文认为,影响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关键因素为体系层面的大国关系变动,以及区域层面的地缘政治变化,而大国关系变动主要是指大国竞争关系的变动,区域层面上主要考察区域的自主性的变动对域内地缘政治的影响。

(二)形成因素分析

1. 大国竞争

无论是全球国际关系还是区域地缘政治,都受到大国关系变化的影响。作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一种“常态”,竞争贯穿于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国际关系史本身就是一部国家间的竞争史,大国竞争更是国际关系互动的核心内容。^②本文认为,对于地缘政治格局来说,大国竞争既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常态,也是影响国际格局变化和区域地缘政治变化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大国竞争对区域地缘政治造成影响,主要通过对区域事务的介入,而介入程度的衡量指标则与大国间竞争的烈度、方式等方面相关。此外,域外主要大国构成了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所处的体系结构,本文所研究的大国竞争是指地理区域范围外的主要大国间的竞争,以便观察体系层面上的因素对区域的影响。

大国在某一区域的竞争的方式有多种,不同的大国竞争方式所带来的竞争烈度不同,也带来不同体系的压力程度。这里需要对大国竞争进行可操作化分析,以便在下文的分析框架中对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大国之间竞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但“由于竞争方式和程度的变动是战略决策者主动选择的结果,大国竞争的水平 and 烈度可以得到管理”^③。因此,大国竞争方式在激烈程度上有所不同,主要的方式可以由激烈程度划分为“软方式”和“硬方式”,从“软”到“硬”,竞争的烈度也随之而提高(见图1)。从软实

① 陆俊元:《新地缘政治结构理论探索——解释模式视角》,《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13页。

② 门洪华、李次园:《国际关系中的大国竞争:一项战略研究议程》,载《当代亚太》,2021年第4期,第5页。

③ 刘丰:《中美战略竞争的限度和管理》,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10期,第2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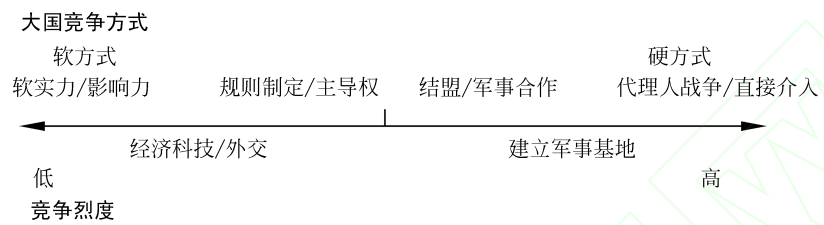


图1 域外大国竞争谱系图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力/影响力的竞争,到发动代理人战争,甚至直接介入地区战争,域外大国的竞争从“软”到“硬”,烈度不断升高,区域面对的外在压力随之不断增加。随着大国竞争方式的变化,竞争烈度发生变化,介入程度也随之发生变化。大国以“硬”方式在区域展开竞争,竞争的烈度加剧,介入程度也随之升高。当大国以军事直接介入或发动代理人战争,对一个区域事务进行干涉时,其对手也会进行大量的军事经济方面的投入,加深了区域内的地缘政治对抗,易促使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造成区域的地缘政治态势发生变化,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受到影响,促使紧密结构松散化,或者加深地缘政治结构松散程度,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形态的稳定,为形成地缘政治的“破碎地带”提供条件。例如,在冷战期间,美苏在东南亚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由此引发的美国直接介入越南战争,促使东南亚地区面临巨大的体系压力,其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受到严重的影响,导致东南亚地区一度成为地缘政治中的“破碎地带”。大国以“软方式”展开竞争,大国在区域的争夺主要通过规则制定、软实力、经济外交等方式展开,竞争的烈度随之降低。此时大国对于区域的介入程度较低,对于区域内的政治冲突影响较小,继而对区域的地缘政治结构影响较小,区域地缘政治形态也就面临较小的体系层面的压力,地缘政治形态较为稳定。因此,考察大国竞争对区域地缘政治形态影响程度的一个指标就是看大国竞争中是否有介入地区地缘对抗,促使域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对区域地缘政治结构造成严重影响。

2. 区域自主性

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形态的另一个因素,是区域内部地缘结构的运行效率,这种运行效率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区域自主性的变化。从区域层面上看,

区域内地缘政治结构由区域内的国家和区域组织等主要行为体及其互动关系构成,而结构的运行效率取决于这些行为体对域内事务的自主掌握水平的高低、协调能力的强弱。国家、区域组织对自身事务拥有主导能力,能够有效地协调域内的冲突矛盾,减少地缘政治对抗,降低域外势力对区域内的干预的可能,平衡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变动,从而维护区域地缘政治形态的稳定。易言之,区域层面上,区域自主性是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形态变化的主要因素。

一方面,区域自主性包括域内国家对自身事务的主导。“国家在不受外来干预和限制的情况下,有能力和决心根据自身需要和目标做出决策,并且拥有掌控边界外进程和实践的能力。”^①区域自主性越高,区域内国家自身的协调能力越强,国内民族、社会、政治等矛盾也就能够得到有效管控。域内国家自身的协调能力越强,国内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低,域内国家间关系也能够得到协调,有益于提升区域韧性。另一方面,区域自主性还包括区域组织对区域事务的主导和协调能力。区域组织对于协调域内国家关系有着重要的作用,也是对域内国家的自主性的一个“保护罩”。当区域组织的协调能力较强时,域内国家能够在一定的机制、规范、规则下展开合作、协调关系,域内的地缘政治冲突也能得到有效的缓解,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相对较为稳定;反之,区域组织的协调力能力弱,域内冲突容易升级扩散,致使外部势力对区域事务极易介入,地缘政治结构受到影响,松散程度更高。因此,区域自主性影响地缘政治结构的指标就是看域内冲突矛盾是否得到协调,即区域协调能力的强弱。区域自主性低,域内国家和区域组织对区域事务的协调能力弱,区域韧性低,国内矛盾升级外溢或区域内冲突升级扩散,引发域外大国的介入,从而影响区域地缘政治结构,促使“破碎地带”的形成。区域自主性高,域内国家和区域组织协调能力强,对域外大国的介入有抵消、制衡作用,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并未受到大国的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形态趋于稳定。

四、“破碎地带”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在地缘政治结构主义理论视角下,大国竞争与区域自主性是影响地缘

^① 王振玲:《欧盟的东亚外交与安全政策:自主抑或追随?》,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4期,第70页。

政治结构变化的体系层面和区域层面的主要因素。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紧密与松散程度受到大国竞争烈度和方式所形成的不同介入程度的影响。区域自主性则对地缘政治结构起到调试作用,形成不同的地缘政治结构类型,影响了区域地缘政治形态最终变化,从而导致“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的变化(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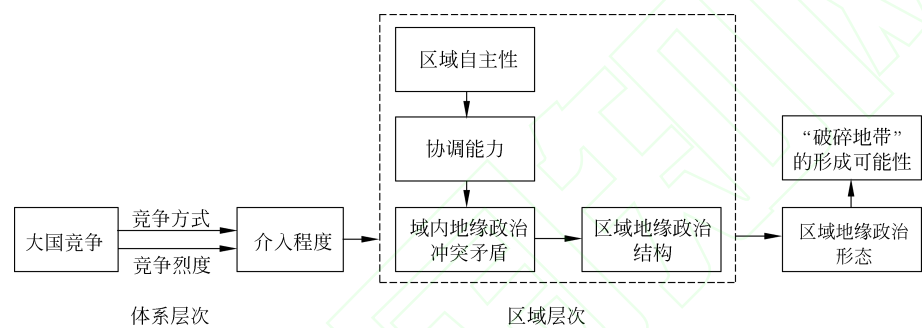


图2 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的一般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一) “破碎地带”的形成逻辑

在体系层面上,大国在某一地区越是展开“硬”竞争,直接介入区域事务,促使域内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就越会影响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引发地缘政治形态变化,“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增加;反之,大国间竞争烈度较为缓和,以“软方式”展开竞争,对于区域事务的介入采取间接介入方式,由大国竞争所导致的域内对抗冲突升级扩散的可能性较小,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受到的影响较小,区域地缘形态的变化受到体系层面的影响较小,此时就需要考虑到区域层面因素的影响。在区域层面上,区域自主性所带来的是区域协调能力的变化,区域的自主性高,有益于协调域内的地缘政治冲突,形成紧密型的区域地缘政治结构,进而有利于形成防范大国干预的能力,降低了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的可能性。这时,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得到维护,形成较为稳定的地缘政治形态,“破碎地带”的形成可能性降低。换言之,区域自主性越高,协调能力越强,区域地缘政治形态越稳定,“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越小。反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对于大

国介入的抵御能力下降,进一步加深区域地缘形态的不稳定,“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区域自主性形成了区域层面上影响地缘政治形态变化的逻辑链条。

综合两个层面因素的关系来看,大国竞争和区域自主性的共同作用形成了与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逻辑关系,而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影响到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大小。据此,本文研究的一个结论为:形成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取决于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变化;从体系和区域层面上,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则受到大国竞争和区域自主性的影响;由于这两个因素自身的变化,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在不同时期发生变化,“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也有所变化,而非像既往研究中将某个地区一直认定为“破碎地带”。^①

(二) “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分析

从上文的分析来看,笔者认为,关于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有以下四种情况(见表1)。

表1 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分析

		大国竞争	
		直接介入	间接介入
区域 自主性	协调 能力强	区域地缘结构较紧密 “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较低	区域地缘结构紧密 “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极低
	协调 能力弱	区域地缘结构松散 “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极高	区域地缘结构较松散 “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较高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参见吴仕海、阎建忠:《地缘破碎带研究进展及展望》,第1109—1122页;Philip L. Kelly, “Escalation of Regional Conflict: Testing the Shatterbelt Concept,”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86, Vol. 5, No. 2, pp. 161-180; Saul B. Cohen, “A New Map of Global Geopolitical Equilibrium: A Developmental Approach,” *Political Geography Quarterly*, 1982, Vol. 1, No. 3, pp. 223-241; Saul B. Cohen, “Global Geopolitical Change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1, Vol. 81, No. 4, pp. 551-580。

第一种情况,大国间展开激烈竞争,对区域事务直接介入,区域地缘政治结构面临巨大的外在压力。在区域层面上,区域自主性水平低,区域协调能力弱,无法形成对大国介入的抵御,域内冲突不断升级扩散,区域地缘政治结构进一步松散化,影响地缘政治形态变化。此时该地区就极易形成地缘政治中的“破碎地带”。

第二种情况,体系层面上大国在区域的竞争烈度低,采取“软竞争”方式,在区域进行间接性的介入,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所面临的体系压力较小,对区域内冲突升级扩散的影响也较小。区域自主性高,域内国家和区域组织的协调能力强,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呈现紧密型特征,域内冲突矛盾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性极高,地缘政治中“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极低。

第三种情况,体系层面上大国竞争较为激烈,对区域事务有直接介入或有此倾向,此时区域地缘政治形态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在于区域层面。区域自主性高,协调能力强,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处于紧密型状态,对大国介入具有相当程度的抵御、平衡能力,区域地缘政治结构仍较为稳定,“破碎地带”形态出现的可能性较低。但是,大国介入的方式随着竞争的烈度不断提升,挑起区域内矛盾,使之升级扩散,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受到严重影响,地缘政治形态也就容易发生变化。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并非不能出现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

第四种情况,区域自主性较低,内部协调能力弱,无力整合域内力量,地缘政治结构较为松散。在这种情况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就较低,其本身就带有“破碎”的性质特征,继而无能力抵御外来压力,“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较高。但这并不意味着“破碎地带”的形成,区域内自主性的缺失只是造成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呈现松散型特征,此时,大国竞争就成为影响区域能否形成“破碎地带”的关键性因素。当大国的竞争烈度较低甚至展开合作,并对区域内进行良性干预时,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会得到改善,从而提升区域自主性,增强地缘政治结构的紧密度,避免“破碎地带”的形成^①;反之,大国介入程度提升,则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就增大。

^① 大国在区域内展开合作对区域稳定性影响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笔者在此做简要说明,以保障文章的逻辑完整程度。

五、案例分析

在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常常把固定的区域定义为“破碎地带”。^①但从历史和现状来看,区域稳定性是一种变化的状态,也就是这些区域并非一直是“破碎地带”形态。在选取相关区域作为案例之时,不仅仅要考虑到区域的地理位置,更为重要的是考察形成“破碎地带”的条件,即历史时段中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变化。综合现有的研究,笔者认为,在选择相关区域分析其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变化的同时,还需要选择相关时间段做观察,以便分析其中各因素的变化,从而能够做出更为准确的分析。根据上文对“破碎地带”概念的探讨,笔者选取以下几个不同时期的不同区域展开探讨,包括中东地区(1948—1975年)、东南亚地区(1985—2010年)、中东欧地区(1992—201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1980—2002年),通过分析以上区域在特定时间段内所面临的大国竞争和自身区域自主性的变化,来探讨“破碎地带”的形成可能性。

(一) 中东地区

无论是一战后还是冷战期间,英法美苏等大国都在中东地区展开过激烈的竞争,策划各种代理人战争,甚至是派遣军队直接参与战争,使得中东地区长期处于外在压力之下,对中东地区的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形成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冷战时期,美苏的战略竞争是全方位的,但美苏对抗是逐渐升级的。“在华盛顿、伦敦和莫斯科的最高层中,一种不安全感却在不断上升,这种不安全感来源于战时他们为确保自身的战后安全所采取的行动。”^②在这种竞争对抗升级的状态下,美苏在中东巴以地区的介入也是逐渐提升。随着1947年以色列建国后,双方在该地区的投入越来越多,展开诸多“硬竞

^① 有学者研究总结认为地缘政治中存在8个“破碎地带”,分别是东中欧、中东—北非、南亚、东亚、中亚、东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中美洲。参见吴仕海、阎建忠:《地缘破碎带研究进展及展望》,第1113页。

^②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London: Penguin Press, 2005, p. 27.

争”,可以从美国的相关援助变化看出这种态势。美国从1948年开始,对以色列展开援助,但这种援助也是随着冷战期间美苏竞争升级而提升的。“从1949年到1965年,美国对以色列的援助平均每年约为6800万美元,其中95%以上为经济发展援助和粮食援助;而军事援助项目始于1959年。从1966年到1970年,平均每年的援助增加到约1.02亿美元,其中军事方面增加到47%。”^①与之相对应的是苏联在该地区的战略升级加剧了这种对抗的态势。就苏联来说,在冷战初期其与阿拉伯国家并未有过多的利益关联,并未对中东地区过多涉足。“苏联在巴勒斯坦并没有直接的物质利益和其他利害关系,它之所以对巴勒斯坦问题感兴趣,是因为苏联是联合国的一个成员国。”^②然而,随着冷战的逐步升级,加上中东的战略位置和石油资源的开发,美苏双方在该地区的介入程度也不断提升。美国政府在1957年伊始保卫中东各国,使其免于“来自国际共产主义控制的任何国家的公开武装侵略”^③。与此同时,美国也成为以色列一方的重要支柱,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后,美以开始建立“特殊关系”,美国开始推行向以色列提供先进武器政策。^④而“20世纪50至60年代,苏联通过与埃及、叙利亚等国签署多项合作协定,依靠军事援助和政治支持等方式在中东地区发挥影响力”^⑤。从整个美苏在中东地区的竞争来看,其方式已经是一种“硬竞争”的方式,包括一系列的军事援助、战争方面的政治支持,并且随着局势的变化而不断升级,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双方介入的节奏才得到放缓。因此,在中东以巴以为核心的区域内,1948—1975年激烈的大国竞争形成了

① Clyde R. Mark, *Israel: US Foreign Assistance*, 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Dec, 2001, p. 1, https://pdf.usaid.gov/pdf_docs/pcaaa469.pdf, 访问时间:2023年4月20日。

② 国际关系研究所编:《巴勒斯坦问题参考资料》,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65页。

③ John Lewis Gaddis,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ive History*, New York: McGraw-Hill, 1990, p. 221.

④ Cheryl A. Rubenberg, *Israel and the American National Interest: A Critical Examination*,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6, p. 12.

⑤ 崔铮:《俄罗斯对中东国家的军事外交》,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7年第1期,第33页。

巨大的体系压力,并且这种压力随着美苏竞争烈度的提升而不断加大,对于该区域的稳定性造成了影响。在几次战争冲突中,美苏并未作为协调者,而是不断加大介入的筹码,促使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化,地缘政治形态不稳定加剧,“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大幅提升。

从区域层面上看,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对外依赖性较强,区域自主性较低,区域内协调能力较弱,域外大国的干涉极容易发生,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恶循环。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东地区国家寻求自主性就已经反映在彼时的国际关系史和反殖民史当中,但均未成功构建起该区域的自主性。二战后,中东地区掀起反帝反殖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积极谋求国家独立,争取战略自主和民族解放。然而,这些新兴民族国家在建国初期往往采取较为激进的政策,国家间的矛盾并未得到缓解,加之以色列的建国与相关的大国干预对地区稳定性造成负面的影响。此阶段的区域层面上,中东地区的自主性有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并且“中东至今没有形成稳定的地区结构(包括地区安全机制),使其既无法实现自强,也无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甚至主动邀请外部势力进入,从而使地区局势持续动荡”。^①在1948—1975年,这种自主性呈现出一种直线下滑的状态,在第一次中东战争到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围绕着阿以间各种矛盾以及相关国家的内部矛盾,地缘政治冲突不断上升,对抗加剧,并波及大部分中东地区。此外,区域组织在此时期尚未构建起约束性强的规范,即使早在1945年就成立了阿拉伯国家联盟(League of Arab States, LAS),但其对该区域自主性的提升并未起到相应的作用。另外,此时期中东地区的国家对于国家主权和区域组织的认识也使得LAS等区域组织无法真正发挥作用。“阿拉伯国家之间合作薄弱、阿拉伯联盟的制度设计反映了该地区的领导人主要关注的是国内政权生存。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治和共同身份导致阿拉伯国家接受阿拉伯统一的言论,以使其政权合法化,并在实践中害怕阿拉伯统一,因为他们认为统一将对主权造成限制。”^②因此,该地区的区域组织无法构筑

① 田文林:《地缘政治、中东破碎地带与利比亚战争》,第28页。

② Michael Barnett, Etel Solingen, “Designed to Fail or Failure of Design? The Origins and Legacy of the Arab League,”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Amitav Acharya, eds., *Crafting Cooperation: Regional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181.

起与国家的良性互动,也无法构建起约束性的规范,也就无法促使地区国家之间的合作,从而导致区域组织的自主性水平十分低,协调区域内矛盾的能力缺失,致使此时中东巴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化。

总之,在处于冷战环境中的1947—1975年,美苏等大国在中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硬竞争”,对中东巴以地区的事务展开直接介入,中东巴以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因而面临较大的外在压力,加深了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松散化,区域地缘政治形态不稳定程度加剧;而在区域层面上,中东巴以地区的区域组织和国家的自主性较低,区域的协调能力弱,地区冲突不断升级扩散,区域无法对体系形成抵御力,为美苏等大国提供了直接介入的“支点”,从而使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松散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最终导致地缘政治形态呈现出“破碎地带”的形态。

(二) 东南亚地区

东南亚地区在传统地缘政治研究中一直被认为是“破碎地带”^①,按照本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冷战期间的东南亚地区确实能够满足“破碎地带”形成的条件。二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脱离殖民统治,建立独立的现代国家。“破碎地带”之所以能够形成,是因为它们在历史上属于那些地缘政治大国的殖民地,摆脱这种地位后,当地内部各种势力之间始终存在着冲突。^② 独立并非意味着弥合内部分歧,反而造成分歧的加剧。^③ 殖民国家离开后,独立的国家所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获得以及保持国家团结。^④ 独立后的东南亚国家都亟须在多民族型的社会中实现国家统合和国民统合,当政府焦急地强制推行统合时,不少国家产生了分裂、叛乱和纷争的状况,并

① 参见秦奇、成升魁:《东南亚地缘格局时空演变研究》,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8期,第15—26页。

② 李义虎:《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2页。

③ 尼古拉斯·塔林编,贺圣达、陈明华等译:《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9页。

④ 米尔顿·奥斯本著,杨浩浩、曹耀萍译:《东南亚简史》,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页。

陷入政治混乱的泥沼之中。^① 以上情况为东南亚地区的“破碎地带化”提供了基础,在美苏大国竞争下,东南亚地区极易成为“破碎地带”。但随着冷战的结束,在东南亚地区的大国竞争趋于缓和,且竞争的方式趋向于“软竞争”,即争夺在地区内的影响力,竞争的方式多采取科技、经济、软实力等“软方式”。与此同时,东盟无论从组织规模还是治理模式上都有了质的提升,价值冷战后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虽然经历了金融风暴,但整体上局势较为稳定,这进一步促使区域自主性的提升,形成了较高的区域韧性。2010年后,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地区格局发生变化,中美竞争态势凸显。虽然未出现美苏冷战时期的对抗性竞争,但由于局势仍在变化,中美对东南亚的影响也在变化,为避免案例分析失效,本文选取1985—2010年的时间段进行分析。

在体系层面上,冷战结束前夕,大国在东南亚的竞争烈度降低,介入方式由直接介入逐渐转为间接介入。美国虽然在越南战争后撤出了中南半岛,但未全面撤出,只是战略收缩,而苏联由于自身的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末也开始进行战略收缩,降低了对东南亚地区的介入,尤其是对越南的援助和支持的降低,促使该地区的美苏对抗的烈度下降。越战失利后,美国进行战略收缩,而此时苏联却加大了对越南的支持,介入东南亚地区内问题,促使越南对地区霸权的争夺,加剧了地区的不稳定。仅1981—1985年,苏联向越南提供了5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经济援助达到每年18亿美元。^② 然而,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国内政治、经济状况的变化,苏联对外战略收缩,停止对越南的援助,随后从金兰湾撤军,并且“在地区‘热点’柬埔寨问题上,苏联敦促越南从柬埔寨撤军”。^③ 1991年苏联解体,苏联在东南亚地区的影响力全面消亡,此时日本、印度、中国等域外大国都无力与美国在此地区展开全面性竞争,大国竞争的烈度下降,体系层面的外在压力降低。

① 岩崎育夫著、廖怡静译:《从东南亚到东协:存异求同的五百年东南亚史》,商周出版社2018年版,第138页。

② V. Largo ed., *Vietnam: Current Issues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2002, p. 177.

③ 马嫒:《论前苏联与俄罗斯的东南亚政策及其影响》,载《国际观察》,1998年第2期,第32页。

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内,东南亚地区的大国竞争烈度趋向于“软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包容性竞争。^① 这种竞争的方式多以经济、科技等软实力等方式展开,大国的介入方式趋向于间接方式。在东南亚地区,除了美国有军事基地外,其他域外大国没有介入该地区的支撑点,这降低了大国展开激烈竞争的可能性,也有助于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矛盾的缓解,促进东南亚的区域地缘结构的稳定。

与体系层面的大国竞争变化相比,在区域层面上,东南亚地区的国家经历了独立建国初期的激进民族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后,地区内大多数国家基本进入了稳定发展时期,国家内部矛盾和主要国家间的地缘政治冲突逐步得到有效缓和。“到20世纪80年代末,东南亚国家似乎已实现自己内部的安全,它们更关心的是经济繁荣而不是刺耳的民族主义。”^② 冷战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在经历民族独立、发展道路探索之后,形成了有益于自身发展的政治模式,国家的自主性相较于冷战初中期得到提升,这种自主性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在1967年成立了东盟,并开始在其中建立一个分区域安全机制,而不是激化彼此之间的民族认同”^③。1976年,东盟国家签订《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了相互尊重彼此的独立、主权、平等、领土完整和民族特征,互不干涉内政,用和平的手段解决分歧或争端,放弃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等国家相处的重要原则。^④ 这种在地区安全治理中导入国际规则的做法,有利于增进成员之间的政治互信,解决国家间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问题^⑤,

① 包容性竞争是指大国竞争尚未达到对抗性竞争的一种中间状态。参见刘若楠:《大国安全竞争与东南亚国家的地区战略转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4期,第69页。

② 尼古拉斯·塔林编:《剑桥东南亚史(第二卷)》,第503页。

③ Barry Buzan and Ole Wæver,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134.

④ Asean, *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24 February, 1976, <https://asean-aipr.org/wp-content/uploads/2018/07/Treaty-of-Amity-and-Cooperation-in-Southeast-Asia-1976-TAC.pdf>, 访问日期:2023年4月20日。

⑤ 张云:《东南亚区域安全治理研究:理论探讨与案例分析》,载《当代亚太》,2017年第4期,第143页。

更为区域内国家解决自身矛盾提供了域内的机制和平台,提升了区域自主性。当然,此时的东盟也带有明显的对抗性,直到冷战结束,东盟终于迎来新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基本加入了东盟这一区域合作机制之内。“这不仅对东南亚地区,而且对于东亚和整个亚太地区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影响。”^①1990年前后,在处理柬埔寨问题上,东盟有效地协调了域内外的各方利益,促使该问题得到和平解决,抑制了冲突的再次爆发。为了进一步避免东南亚地区再次出现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的情况,东盟选择接纳越南。1995年,越南成为东盟正式成员国,越南的加入使得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东南亚地区安全复合体有了明显的区别。^②此后,东盟进一步扩大,基本涵盖整个东南亚地区国家。^③在处理内部矛盾的同时,东盟与域外主要大国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促进各方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1994年举办的东盟地区论坛,将域外主要大国纳入对话机制,建立起预防性外交机制,促进了地区和平和稳定。2007年东盟各国签署《东盟宪章》,进一步推动了地区合作与安全机制建设。与此同时,东盟采取“大国平衡战略”,在中美等大国间保持平衡,防止单一大国对此地区掌握主导权,也防范大国过多介入地区事务。

冷战结束前后至21世纪初,东盟的扩大与发展使得东南亚地区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内部互动机制。东盟方式中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互不干涉内政、协商一致,这保证了在与域外国家来往之时东盟自身的自主性,并且发展出以东盟为中心的各项多边机制,提升了东南亚的区域自主性,也促进了东南亚地区的协调能力,不仅有助于区域地缘政治冲突矛盾的化解,也有助于防范大国的介入,这就使得东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提升,地缘政治形态趋于稳定。与此相对的是,东南亚地区此阶段面对的体系层面的大国竞争从美苏的激烈竞争转变到冷战后大国间低烈度的竞争,大国对东南亚地区的介入由直接转变为间接,使得域外因素导致地缘政治冲突

① 张蕴岭:《东盟50年:在行进中探索和进步》,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7年第7期,第25页。

② Alan Collins, *The Security Dilemmas of Southeast Asia*,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Springer, 2000, p. 98.

③ 2022年11月东盟接纳东帝汶为第11个成员国。

矛盾升级扩散的可能性下降,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结构更加紧密化,区域的地缘政治形态更加稳定,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大大降低。

(三) 中东欧地区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近代以来欧洲列强的争夺战争,还是冷战期间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中东欧地区向来是大国博弈的重点地区。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和宗教状况十分复杂,也有学者将该地区称为“马赛克式”的民族分布状况。^① 冷战结束后,在体系层面上,中东欧地区主要面临的是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竞争,1992—2013年两国竞争关系的变化比较明显。1991年苏联解体后,俄罗斯采取了亲西方的政策。“俄联邦外交部1992年制定的《外交政策构想》文件中就曾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和美国的关系‘将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保持优先位置’。”^② 俄罗斯在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处于较为弱势的一方,其在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远不及苏联时期,而此时的美国虽然推动北约(NATO)东扩,但在处理涉及俄罗斯相关问题时并未展开激烈竞争。1997年5月,北约与俄罗斯签署《俄罗斯和北约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基本文件》,美国和北约作出不在北约新成员国部署核武器和驻军的含糊承诺,回应俄罗斯的相关诉求,吸收俄罗斯进入七国集团,并向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等;俄罗斯则放弃了与北约签署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的要求,默认北约东扩的行动。^③ 在此阶段中,虽然俄罗斯并不想退出中东欧地区,但碍于实力受限而对美国的相关动作采取了妥协的态度。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对俄仍然保持遏制的政策态势,其中包括持续推动北约在中东欧的扩张。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发动对科索沃的军事行动,引起俄罗斯的不满,使

① Stephen R. Bowers, “Ethnic Politics in Eastern Europe,” *Conflict Studies*, 1992, No. 248, p. 9; 孔寒冰:《东欧民族分布的“马赛克现象”》,载《世界知识》,2012年第1期,第65—66页。

② 国玉琦,丘德诺夫:《地缘政治与世界秩序》,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220页。

③ 参见冯玉军:《俄罗斯与北约签署相互关系基本文件》,载《国际资料信息》,1997年第6期,第14—17页。

后者意识到“北约不会允许俄罗斯参与到行动决策机制当中”。^①但此时的美国并未完全排斥俄罗斯,在第二轮东扩时,“既要审慎地稳步推动,又不至于使北约与俄罗斯的关系破裂”^②。美国通过战略安抚来换取俄方对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的默认,普京在执政后面对美国和北约抛出的橄榄枝,也做出积极的回应。“9·11”事件后,双方在反恐领域和阿富汗问题上加强了合作,虽然此间俄罗斯对于北约第二轮东扩特别是波罗的海沿岸的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表示不满,“但最终还是因国力和影响力所限,加上普京政府想以战略妥协换取美俄关系的稳定和与北约建立新型关系等多重考虑,只好无奈接受北约第二轮东扩的现实”^③。美国对俄政策并未放缓,反而越来越强硬。俄罗斯方面,“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实力逐渐恢复,并主张大国地位和对后苏联空间的主导”^④。在这种情况下,北约持续东扩,至2007年,中东欧地区大多数国家已经加入北约,取得了与俄罗斯在地缘政治竞争方面的优势,加深了与俄罗斯的地缘政治矛盾,最终2008年爆发了俄格战争。此后,美欧对俄实施广泛的制裁,增加在中东欧地区的军事存在,虽然没有完全采取对抗的政策,但美俄之间的竞争逐步升级。直到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美俄大国竞争达到一个顶峰状态,两国直接介入地区冲突,导致中东欧地区面临更为激烈的大国竞争,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化趋势加剧。总之,1992—2013年,中东欧地区面临着不断升级的大国竞争状态,该区域所面临的体系压力随之增大,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受到外部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然而,该地区未成为“破碎地带”,其原因在于区域的自主性在这段时间内起到了平衡作用,使得“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降低。

① Edward W. Walker, “Between East and West: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Geopolitics of The Ukraine Crisis,” in Agnieszka Pikulicka-Wilczewska and Richard Sakwa, eds, *Ukraine and Russia: People, Politics, Propaganda and Perspectives*, Bristol, UK: 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5, p. 148.

② F. Stephen Larrabee, “NATO Enlargement after the First Round,” *The International Spectator*, Vol. 34, No. 2, 1999, p. 81.

③ 胡瑞华:《试析冷战后美俄地缘政治空间竞争》,载《人文地理》,2010年第5期,第109页。

④ 宋芳:《地缘政治竞争中的“软制衡”与“新遏制”:欧美对俄罗斯政策比较研究(2000至今)》,南京大学2020年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第76页。

从区域层面来看,中东欧国家在冷战时期基本是苏联阵营,自冷战结束后,中东欧面临着巨大的社会转型、政治安全稳定的考验。伴随着这种转型,整个中东欧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显得十分动荡,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地区地缘政治结构受到影响。这种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得到改善,中东欧国家的政治逐步取得成功,社会趋于稳定,经济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局部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有升级扩散的可能性。1999年,科索沃战争爆发,北约进行了军事介入,巴尔干地区的地缘政治受到了影响,但此次战争并未扩散至整个中东欧地区。一方面,从整个中东欧地区来看,原社会主义国家与新独立的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逐步趋于稳定,这种稳定带来了区域自主性的提升。另一方面,欧盟对于该地区的区域自主性的提升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北约东扩的同时,欧盟也随之东扩,这也是诸多学者研究的“双东扩”。与北约东扩所带来的地缘政治竞争不同,欧盟东扩带来了中东欧地区区域自主性的提升,欧盟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国家来说不仅产生经济方面的影响,更能带来政治、安全方面的提升。在经济发展方面,从中东欧国家的视角来看,“欧盟是‘繁荣’‘增长’的代名词,入盟可以得到欧盟的援助和补贴”,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①因此,在冷战结束后,中东欧国家积极推动入盟的进程。2004年欧盟基本实现向中东欧地区的扩大,中东欧10国加入欧盟,而剩余国家也陆续加入或申请加入,到2013年涵盖了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不仅仅为中东欧地区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也为该地区的政治安全提供了稳定性的保障。俄罗斯对于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并未有大的抵触情绪,更未提出反对的政策。^②这也说明了欧盟作为区域组织在该地区起到了积极作用,提升了该地区的区域自主性,中东欧国家借助欧盟进行协调,各国间的矛盾得到进一步缓解。与此同时,中东欧地区通过欧盟改善了西欧地区国家与本地区的关系,尤其是在冲突频发的东南欧地区,欧盟有力地推动了该地区的稳定。“欧盟推出《东南欧稳定公约》,‘稳定与协作进程’,并提供新的金融财政援

① 高歌:《中东欧国家入盟与欧盟东扩:是否为同一进程?》,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21年第4期,第89页。

② Mark A Smith, “Contemporary Russian Perceptions of Euro-Atlanticism,” Conflict Studies Research Centre, F74, February, 2002, p. 8.

助。这些机制和扩大的进程都旨在改善‘更为广泛’的欧洲安全状况。”^①随着经济发展,中东欧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提升,参与欧盟事务的能力增强。一些中东欧国家在欧盟相关事务方面发挥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借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之机推动所关注的议程,更有效地参与和影响欧盟事务”^②。这也提升了中东欧地区的区域自主性,促进了区域内行为体的协调能力。在维护自身安全、发展经济等方面,中东欧国家在内部形成了相关合作机制,如波罗的海国家理事会(CBSS)、维谢格拉德集团(Visegrád Group, V4)等相关多边机制,提升了中东欧地区的影响力和区域自主性,进一步推动了对本区域内事务的协调能力,为缓和、对冲来自美俄等大国对该地区的介入提供了机制保障,降低了地缘政治冲突扩散的可能性。

总而言之,中东欧地区在冷战结束到21世纪前十年的时期,经历了从社会转型时期的动荡到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历程,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性得到明显的提升。在此期间,中东欧地区面临的大国竞争主要来自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较量。从冷战结束伊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持续东扩,给俄罗斯带来地缘政治压力;而俄罗斯随着国内政治、经济趋于稳定,对美国 and 北约所采取的政策越来越具有对抗性,尤其在中东欧地区展开了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竞争,这给中东欧地区带来了体系层面的压力,造成地缘政治冲突有升级扩散的可能,影响到了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但在北约东扩的同时,欧盟也进入了该地区,为中东欧地区的发展带来机遇。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国家逐步完成社会转型,经济发展步入正轨,区域内的各种合作机制得到稳步提升,区域自主性也得到稳步的发展,区域协调能力增强,能够对区域地缘政治结构形成“保护伞”的作用,避免松散化程度过高,降低形成“破碎地带”的可能性。但是,大国博弈从未远离中东欧地区,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愈发激烈,美俄等大国的直接介入程度不断加码,中东欧地区的区域自主性受到威胁,协调能力受到体系层面的压迫而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中东欧地区形成地缘政治“破碎地带”形态的可能性将不降反升。

① Alistair J. K. Shepherd, “‘A milestone in the history of the EU’: Kosovo and the EU’s International Role,”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5, Issue 3, May, 2009, p. 529.

② 高歌:《中东欧国家在欧盟中的地位和作为》,载《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4年第3期,第58页。

(四)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①在近现代历史上基本属于被西方列强争夺、殖民的地区,直到二战后,非洲地区的民族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兴起,非洲多数国家随之以各种方式脱离殖民宗主国而独立。但是,独立之后的非洲国家并未迎来和平与稳定的局面。冷战期间,大国在非洲地区展开竞争,域内冲突不断,甚至爆发种族屠杀等恶性事件,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化程度严重,区域地缘政治形态的稳定受到严重的影响。20世纪80年前后,非洲地区内大国竞争的激烈程度呈现出下降的态势,这为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带来了体系层面上的机遇。自冷战伊始,非洲不例外地成为美苏争夺的地区,在争夺新兴独立的非洲国家、培植自身的政治势力上,两个超级大国展开了各种竞争,这种竞争态势在1960年的刚果危机后不断提升。^②在此后的阶段,美苏在非洲地区争夺的手段、方式以及途径并未发生多大的改变,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竞争烈度随着苏联的攻势地位而有所增强。到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对非洲的政策发生变化。由于苏联的扩张政策引起了非洲国家的反感,特别是其对安哥拉的军事介入,招致很多非洲国家的强烈谴责,到20世纪80年代初,非洲已经掀起反对苏联的浪潮,而苏联在此时因过度战略扩张,国内经济发展出现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手改善与非洲的关系,特别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联开始逐渐从非洲撤离。1988年戈尔巴乔夫访美,同意按照阿富汗模式解决西南非洲问题,同年12月,安哥拉、古巴和南非达成了关于古巴从安哥拉撤军的协议,标志着苏联在非洲的代理人战争正式结束;与此同时,苏联也撤离了在埃塞俄比亚的军事顾问和投资项目。^③1991年,随着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以及苏联的解体,苏联在非洲地区的介入结束。与苏联相比,美国在这个阶段主要增加了对于非洲国家的军事援助。1981—1985年,里根政府向非洲地区的军事援助达

① 下文中的非洲地区特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② 时殷弘:《现当代国际关系史(从16世纪到20世纪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58页。

③ 纪洪娟:《冷战时期美苏在非洲的争夺:动因、历程与影响》,载《学术探索》,2018年第9期,第29页。

67.296 亿美元。^①但由于苏联对外战略的转变,美苏关系缓和,美国政府也随之提出与苏联在非洲地区展开合作,力图解决部分地区冲突,美国政府对非援助旋即降低。^②1987年,时任美国国务卿舒尔茨(George Shultz)访问非洲之时宣布对非洲援助比预计减少1.25亿美元。^③伴随着苏联解体,冷战在非洲地区也随之结束,而非洲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因之下降,非洲地区的大国竞争得到缓解,大国对非洲地区的介入程度逐步下降。冷战后,俄罗斯虽继承了苏联的大多数遗产,但整个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非洲政策处于保守的阶段,几乎彻底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撤离出来。此阶段,美国对非洲地区的干预行动也十分有限。正如1995年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美国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安全战略》所言:“美国在非洲地区的安全、经济利益是有限的。解决撒哈拉以南非洲面临的困境,应该主要靠非洲国家自身。”^④总之,冷战的结束导致非洲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下降,“美国除了在非洲高调推进美国模式外,对于其他方面则采取了‘边缘化’政策”^⑤。即使出现了1994年卢旺达大屠杀事件,美国也只是表示“关切”,这种边缘化政策直到2001年后因反恐战争而发生变化。综上可以看到,1980—2002年前后这段时间内,大国在非洲地区竞争的烈度呈现出一种下降的趋势,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对于非洲来说,在体系层面,大国的直接介入趋势呈下降态势,因此地缘政治冲突升级扩散与大国竞争的相关程度亦呈下降的趋势,非洲地区地缘政治形态的变化与区域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

自二战结束后,非洲地区的诸多国家以各种方式摆脱殖民统治取得独

① 梁根成:《美国与非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80年代后期美国对非洲的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0页。

② Michael Clough, *Free at Last? U. S. Policy Towards Africa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ress, 1992, pp. 8-13.

③ Robert I Rotberg ed., *Africa in the 1990s—And Beyond: U. S. Policy Opportunities and Choices*, Algonac: Reference Publications Inc., 1988, p18.

④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Department of Defense, *U. S. Security Strategy for Sub-Saharan Africa*, August 1st, 1995, <https://apps.dtic.mil/sti/pdfs/ADA297401.pdf>, 访问日期:2023年4月30日。

⑤ 宋微:《冷战后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政策研究》,外交学院201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4页。

立,但取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并未完全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国家内部各种形式的权力斗争、军阀混战频发,国家之间民族矛盾、族群冲突激烈,甚至爆发了国家间的战争,而受冷战的影响,美苏大国的干预又加深了这一地区地缘政治结构的松散化程度。20世纪80年代,这种态势仍旧存在,加上此时非洲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这一时期被称为非洲“失去的10年”。面对这种经济危机,非洲国家并未找到有效的解决途径,内部政治局面更为动荡,军事政变频发,进一步致使国家难以实现稳定发展的态势。随着冷战结束,在西方国家的强力推动下,民主化浪潮迅速席卷非洲大陆,非洲政治治理进入“西式民主化治理”时期。^①然而,这种“西式民主”并未给非洲国家带来稳定,反而造成更为复杂的局面,加上冷战结束,非洲地区出现权力真空,导致长期积累的矛盾更为突出。整个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内部或国家之间出现冲突、内战甚至部族大屠杀等严重的暴力事件,这更加深了非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的对抗程度,区域自主性受到严重的影响。区域自主性中的另外一个影响因素在这里也并未起到很好的作用,在此时期内,非洲区域组织的效用较低。早在20年代60年代初,非洲地区就成立了包括非洲统一组织(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在内的一系列区域组织,但在很长时间内,这些区域组织并未对区域内的和平与发展起到协调作用。冷战期间,“非洲安全治理的外部性显著,非洲大陆的安全问题大多通过超级大国、近邻大国和前殖民国家的干预解决”^②。这严重削弱了区域组织的自主性,并且非洲的区域组织纷繁重叠,造成各次区域之间无法达成良性的合作,从而影响到整体的自主性。冷战后,由于大国直接介入的减少,非洲区域组织开始靠自身的力量处理内部事务。虽然“非洲各国需要区域主义,并且希望没有域外大国的直接干涉”^③,但是非洲地区的地缘政治冲突在冷战结束的第

① 张春:《非洲政治治理60年:多重长期困境与潜在创新出路》,载《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69页。

② 陈翔:《“回归区域”?——理解全球安全治理区域化的演进》,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8期,第72页。

③ Louise Fawcett and Helene Gandois, “Regionalism in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Implications for EU Studies,” *Journal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Vol. 32, No. 6, 2010, p. 625.

一个十年内反而更为严重,这也就促使非洲内部对非洲统一组织等区域组织的改造和整合的需求提升,以提升非洲地区内部事务的自主性。虽然2002年非洲联盟的建立为非洲的区域主义发展带来机遇,但1980—2002年前后这段时间,非洲地区自身的区域自主性得不到有效提升,区域的协调能力有限,区域层面对于抑制地缘政治冲突矛盾并未起到有利的作用,导致该地区的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受到严重的影响。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大国竞争的烈度虽然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但并未给该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带来改善,非洲地区形成地缘政治中的“破碎地带”形态的可能性仍然较高。如若再次出现大国在该地区展开激烈竞争的情形,这片区域形成“破碎地带”只差一根火柴。

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21世纪初,非洲地区的区域自主性并未得到明显的提升,抑制了区域协调能力,这不利于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的提升,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依旧保持了地缘政治结构的松散,但这并不意味着完全形成“破碎地带”的形态。根据前文的分析,“破碎地带”是大国激烈竞争和区域自主性缺失共同造成的,而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松散化只是区域内自主性的缺失导致的。当大国展开合作之时,对区域内进行良性干预,区域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化会得到改善;或者,当区域内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得到良性发展、区域内多边机制的作用得到稳步提升之时,区域自主性提升,从而增强区域对域内地缘政治冲突与域外大国的协调能力。此时,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也将得到增益。在这两种情况下,“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将大大降低。也就是说,1980—2002年前后的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松散化程度高,形成地缘政治中的“破碎地带”的可能性较高。

六、结论

对于区域研究来说,地缘政治学是一条重要的理论路径。区域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包含重要的地理因素。但是,地缘政治学在对区域展开研究之时,常以概念先行,将某一区域认定为具有一些特征的区域,然而这也就

容易出现的结果,即先认定区域具有某些特征。此外,“从研究方法上看,传统的地缘政治研究更多的是采取一种诠释性的解释”^①。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并未提供一个合理的研究机制来对某一区域为何出现相关特征做出较为科学的解释。多数研究关于区域的地缘政治特征采用的是描述性的阐述,这种分析往往缺乏理论性的探讨,因此有必要对传统地缘政治学中的相关概念与理论做进一步探索。

本文对地缘政治学中的“破碎地带”做出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和案例分析,以对地缘政治学中相关理论进行研究。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的理论假设前提,结合地缘政治的相关理论,尝试通过“因素+机制”的方法,对地缘政治学中“破碎地带”的形成原因及其可能性展开研究,并构建本文分析框架,结合案例展开分析。通过研究,本文认为,“破碎地带”的形成与体系层面和区域层面中的相关因素的变化有关系,“破碎地带”形成的问题实际是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的稳定程度的问题。基于理论假设和研究问题,本文将大国竞争、区域自主性分别作为体系层面与区域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不同的大国竞争的烈度与方式带来的对区域介入的程度不同,从而对区域地缘政治结构造成的影响范围不同;而区域自主性水平的高低,影响对于区域地缘政治冲突矛盾的协调能力,从而对大国介入产生不同的制衡作用,引起区域地缘政治结构稳定程度的变化,影响区域地缘政治形态的变化,造成“破碎地带”形成可能性的不同结果。本文选取四个区域作为案例,即中东地区、东南亚地区、中东欧地区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每个区域选取不同的时间段,以求能够更好地对“破碎地带”的形成可能性进行分析。

对于“破碎地带”的探讨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层面,更应该关注区域发展的现状。一个区域在某一时间段内的稳定性高或低并不能说明该区域的稳定性一成不变,“破碎地带”并不是固定的结论。中东地区在冷战期间乃至冷战后较长时间段内处于“破碎地带”的状态,但并不意味着中东地区就一直是这种状态。降低“破碎地带”形成的可能性是研究其形成原因的现实

^① 叶成城:《地缘政治的批判与重构——一个初步的分析框架》,载刘鸣主编:《中国周边地缘环境新趋势:理论分析与战略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观照。从本文的理论探讨出发,大国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其竞争的方式和烈度可以得到控制,大国对其自身的克制能够为区域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体系层面的利好。同时,域内国家间与组织间加强合作,能够提升区域自主性,为区域内的各种政治关系提供有效协调,降低域内矛盾的升级,为区域的稳定提供保障。